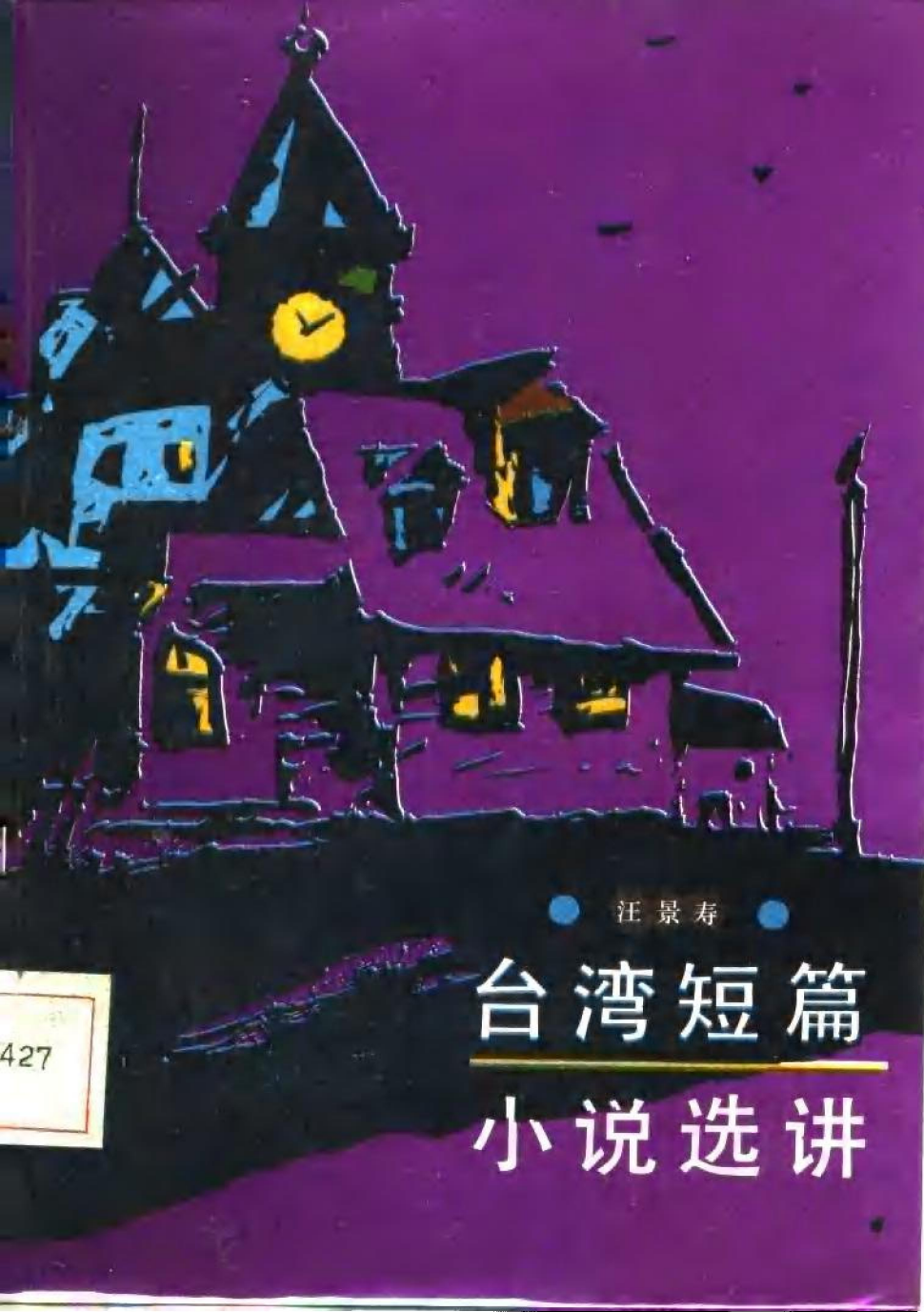




汪景寿

台湾短篇 小说选讲

427

674
台湾小说选讲

汪景寿

*

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 (太原并州北路十一号)

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: 787×1092 1/32 印张: 21.25 字数: 459千字

1986年7月第1版 1986年7月太原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3,000册

*

书号: 10397·68 定价: 3.90 元

目 录

略论台湾文学的民族传统·····	1
(代前言)	
一杆“称仔”·····赖 和	29
赖和及其《一杆“称仔”》	
先生妈·····吴 浊 流	50
吴浊流及其《先生妈》	
送报夫·····杨 達	76
漫话杨達の《送报夫》	
贫贱夫妻·····钟 理 和	123
漫话钟理和及其《贫贱夫妻》	
金鲤鱼的百衲裙·····林 海 音	147
旧时代的苦歌	
——读《金鲤鱼的百衲裙》	
姐姐的心·····於 梨 华	168
铜臭蚀掉的人心	
——於梨华《姐姐的心》读后	
槟榔城·····郑 清 文	193
“冰山的风格”	
——漫话郑清文的《槟榔城》	
将军族·····陈 映 真	216
“同是天涯沦落人”	
——陈映真《将军族》读后	
永远的尹雪艳·····白 先 勇	243

白先勇及其《永远的尹雪艳》

奴才……………东方白 271

历史残留的印记

——简介东方白的《奴才》

我爱玛莉……………黄春明 296

黄春明及其《我爱玛莉》

目 录

嫁妆一牛车.....	王 楨 和	362
别开生面的《嫁妆一牛车》		
金水婶.....	王 拓	396
震撼心灵的《金水婶》		
归来.....	李 永 平	462
乡土风情、异闻传说的画图		
——李永平《归来》读后		
大火.....	东 年	489
洗除罪恶的大火		
——试谈东年的《大火》		
打牛浦村.....	宋 泽 莱	511
窒息心灵的阴霾		
——宋泽莱《打牛浦村》读后		
病房.....	吴 念 真	579
治不好的心灵创伤		
——吴念真《病房》读后		
乐山行.....	蒋 晓 云	617
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		
——《乐山行》读后		
鸡翎图.....	张 太 春	649
别具一格的“怀乡篇”		
——读张大春《鸡翎图》		
后 记		

略论台湾文学的民族传统

（代前言）

从新文学运动说起

台湾的新文学运动发端于1920年，以《台湾青年》创刊为标志。不论其历史背景、发展过程，还是代表人物、创作成果，都鲜明地反映着台湾文学的民族传统。

新文学运动发端之日，台湾跟祖国大陆一样，正处于灾难的年代、动乱的年代、觉醒的年代。十六世纪以来，外国侵略势力开始染指台湾，台湾门户逐渐对外开放。随着掠夺性贸易的发展，外来文化的影响逐渐增强。另一方面，台湾人民反侵略的英勇斗争前仆后继，从未停息。明朝以来，中国政府不断加强边陲宝岛的力量，大量移民。从1661年到1811年的150年里，台湾人口由10万人增至200万以上，骤增20倍。除了自然增长以外，绝大部分是大陆移民。他们带来的中原文化与当地文化结合，逐渐形成带有台湾色彩的中国文化。1895年，日本强占台湾，推行同化政策，禁汉文而倡日文，致使台湾文化岌岌可危，文化的“危机感”和“饥饿感”笼罩着台湾。新文学运动的先驱者们痛感于此，在早期新文学运动的喉舌《台湾青年》上连续发表《糟糕的台湾文学界》（张我军）、《为台湾的文学界一哭》（张我军）、

《智饥识荒和救济方法》（冰瑤）等文章，认为“台湾的文学界，好象冬天的枯木，好象荒野中的掘墓，好象沙漠中的石头堆”。①

应当强调，新文学运动发生以前，台湾文学并非一片空白。如果一笔抹煞，同样有割断台湾文学的民族传统之嫌。当时的文学形式主要有旧诗词、旧小说以及民间歌谣故事等。且以旧诗词为例略作说明。

台湾的旧诗词源于大陆的诗词。到了日据时代，逐渐沦为少数文人无病呻吟的唱和之作。流弊虽多，却也并非一无可取。连批判旧诗词最为激烈的张我军也不得不承认它有“美点”：1.养成文学的趣味；2.磨炼表现的功夫。这无疑是着眼于民族传统的继承。

吴浊流回顾他参加的拥有140多个成员的苗栗诗社时说：“与他们往来之后，才知旧读书人另有一个社会观。他们都不服日本人统治，但表面上不敢露出来，行为多异常人。”②这个诗社里的刘云石老先生就是“多异常人”的一个。“不惧权威，保持人格，不为名利，超然有独鹤之感。”御用绅士汤秀才充当公馆区长，刘云石写了对联，公然贴在他家犬厅之上：

清国秀才恰似过时月历

公馆区长犹如再嫁新娘

因参加苗栗抗日运动而被捕判刑的诗人吴颂贤（雅斋）曾赋诗抒怀：

别也忧兮归也忧，

人生悲苦莫如囚。

当年事业成灰烬，

此日雄心付水流。
有志替民谋福利，
无颜故里话良俦。
几时重到中华地，
了却今朝满面羞。

这些诗词里洋溢着的感情和骨气，正是我国诗词人民性的优秀传统文化的鲜明体现。

台湾新文学运动步“五四运动”之后尘，决非时间上的巧合。它受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思潮的启示，也以普及白话文为旗帜。黄呈聪《论普及白话文的新使命》和黄朝琴《汉文改革论》是人们公认的启蒙之作。黄呈聪在文章里特别强调“到过中国”才受到启示：“回想我们台湾的文化，到如今犹迟迟没有活动，也没有进步的现象，原因是在哪儿呢？我要回答说，是在我们的社会上没有一种普遍的文，使民众容易看书、看报、写信、著书，所以世界的事情不晓得，社会的里面暗黑，民众变成愚昧，故社会不能活动，这就是不进步的原因了。”^③那么，出路何在呢？他的回答很明确，普及白话文。据他考察，“自从唐以来，没有一代没有白话的著作。”“我们是中国民族的系统，读过了这种的白话文也是久了”，“不如再加多少的功夫，研究中国的白话文，渐渐接近他，将来就会变做一样，那就不但我们的范围扩大到中国的地方，就是有心到中国不论做什么事也是很方便，大家若是这样想，就我们的台湾虽是孤岛，也有了大陆的气慨了！”^④可见，白话文不是什么外来之物，而是自古以来就在台湾生了根的。普及白话文，乃是顺理成章的事。黄朝琴则以幽默而又夸张的语调描绘了文言文的悲观景象，把这

种只有少数人懂的文字称为“罪过”，并且呼吁：“不论何国的文字，切不可使为少数人的私有物，必要做一般民众公用的物品。就说汉文罢，亦不是我们少数人的滋养料（营养品），一般民众亦不可缺少这样保全精神生命的白米饭，所以我们应该分出一半的精力和时间，把难解的汉学，做成一个大面包，让多数的同胞，不分彼此的同来享受他的滋味，这才是有福大家享，天下得太平。”^⑤他不仅鼓动别人，还从自我做起：“自费宣传，且带有种种的参考书。”“实行方法有数款，第一就是在东京数年，对同胞不肯写日本文。第二我的写信从今以后全部用白话文，不拘古法，不怕人笑。第三就是时常用白话发表我的议论。第四就是愿当白话文讲习会的教员。”他还大声疾呼：“社会兴亡，匹夫有责”，“可敬的兄弟，快起运动，快起运动！”^⑥当时台湾的白话文普及，从内容到方法，都与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一脉相承，如果把它称之为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的缩影，真是再恰当也不过了。

普及白话文是新文学运动的序曲，不久就深入到文学运动的各个方面。这一运动的先驱者是一批热衷于新文化的知识分子。他们之中有不少人到过日本，除极少数沦为日本统治阶级的附庸工具外，大多数人学外国人之学以御外，承受席卷世界的自由解放的潮流，转过来反抗日本对台湾的掠夺和统治。早期新文学运动的刊物，如《台湾青年》、《台湾》、《台湾民报》均在日本东京出刊而又经常遭到查禁，就是明证。他们之中也有不少人来大陆，承受“五四”运动以来的新思潮的影响，与留学日本的知识分子汇合一起，以文学为武器，投入抗击日本侵略的民族解放斗争，强烈地反抗外来侵略和维护民族传统，这是他们的突出特色。朱西宁《回归何处？

如何回归》一文里说：“当初的民族文学，是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，同时也有的连带反抗它的资本主义侵略——代表性作家如杨逵，据说他的两位公子一名反帝，一名反资，真是彻底而现身说法。”⑦

张我军和赖和都是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先驱者，他们的生活道路和文学业绩也体现着台湾文学的民族传统。

自称旧文学“清道夫”的张我军，1902年生于台湾，早年进入私塾习学汉文，19岁到厦门新高银行鼓浪屿支行服务，接受祖国“五四”运动新思潮的熏陶，成为一生的转折点，后来到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念书，投身新文学运动。从1924年4月2日发表《致台湾青年的一封信》开始，陆续写了《糟糕的台湾文学界》、《为台湾的文学界一哭》、《请合力拆下这座败草丛中的破旧殿堂》、《绝无仅有的击钵吟的意义》、《揭破闷葫芦》、《文学革命以来》、《随感录》、《新文学运动的意义》等多篇文章，激烈地攻击当时迷漫台湾文坛的旧诗词，引起一场新旧文学的大论战，对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发展确实起了“清道”的作用。他在《请合力拆下这座败草丛中的破旧殿堂》一文里说：“我不敢以文学革命军的大将自居，不过是做一个导路小卒，引率文学革命军到台湾来，并且替它呐喊助攻罢了。”“引率文学革命军到台湾来”，是他多次强调过的，事实正是如此。在这篇具有纲领性的文字里，引证了胡适《文学改良刍议》里的“八不主义”，结合台湾文坛的情况，逐一加以发挥阐述。在他看来，台湾新文学运动必须以中国新文化运动为师表，才有真正的出路。他说：“台湾的文学乃中国文学的一支流。本流发生了甚么影响、变迁，则支流也自然而然的随之而影响、变

迁，这是必然的道理。”⑧

赖和生于1894年4月24日，从小不肯剪掉那当时作为中国人的标志的辮子，拒绝上日本学校而习学汉文。后来入台湾医学校学医，故有“诗医”之誉。1917年到福建厦门博爱医院服务，虽说“此行未是平生志”，思想上却有新的开拓。其孙赖恒颜回忆说：当时赖和“受五四运动的冲击，深感民族自决的重要性，尤其对启迪民智的重要性有进一步的看法，文学不再认为是某一阶层人士的专利品，对白话文的推动遂一己之力。”⑨他早年以旧诗享誉文坛，一生有两个明显的特点：其一，著唐装，即台湾服，不穿日本服装；其二，写作使用汉字，宁可先用文言成文，然后改为白话，也不肯使用日文。赖和最大的贡献是他的白话文小说。守愚《小说与赖云》一文里说：“第一个把白话文的真正价值具体地提示到大众之前的，便是赖云的白话文文学作品。”⑩当时，旧诗词桎梏着台湾文坛，日本统治者在台湾学校里强制推行日文教育，更使汉文面临危机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受“五四”白话文运动影响的赖和的白话文小说，显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。他的小说作品闪耀着反抗外来侵略的民族觉醒的火花。他以“忍看苍生受辱”的悲愤心情，对惨遭虎狼般的殖民主义掠夺的穷苦百姓寄予极大的同情，对以补大人（警察）为象征的日据时代的黑暗统治予以深刻的嘲讽。他的著名诗句：“剥尽膏脂更摘心，身虽苦痛敢呻吟。忍饥巢米甘完税，身病惊寒尚典衾。”与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“夺我身上暖，买尔眼前恩，进入琼林库，岁久化为尘”，恰有异曲同工之妙。尤为可贵的，赖和热情地歌颂弱者的奋斗，在小说里塑造了舍身与日本侵略者相搏斗的秦得参（《一杆

“称仔”》）、“鲈鳗”（《浪漫外纪》）、林先生（《善讼人的故事》）等动人的艺术形象。作为“诗医”，不仅热心为民间解除疾患之苦，还为文化人医治性格弱点和精神创伤，鼓舞民族解放的战斗意志。所有这一切，不是与“五四”新文学运动的精神一脉相承的吗！

台湾新文学运动以报刊杂志为阵地。创刊于东京的《台湾青年》历来被当作新文学运动发端的标志。东京是日本首都，但因受到席卷世界的民主自由思潮的影响，伸向新闻刊物的魔爪不如日据台湾当局那么锋利。因此，1923年创刊的《台湾民报》最初也在东京出版，1927年《台湾民报》迁到台湾，表明新文学运动的蓬勃发展，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。此后，《狂人报》、《明日》、《洪水报》、《现代生活》、《台湾文学》、《台湾文艺》、《南音》、《人人》、《福尔摩沙》、《先发部队》（后改为《第一线》）、《台湾新文学》、《新文学月报》相继创刊，恰如雨后春笋一般。蔡铎生《祝台湾民报创刊》一文末尾赋诗：

民报达民情，
民权任你评，
民心真未死，
民族自增荣。

“民族自增荣”，正是新文学运动的要津所在。

这些新文学的阵地，到处开放着争取民族解放的花朵。一一加以阐述介绍，显然不可能。有幸的是，黄得时在《台湾新文艺的风貌》一文里作了很好的概括，把当时散见于报刊杂志的文学作品分为以下八类：

一、描写日本人对台湾人的歧视和差别待遇。

二、描写日人对台湾的经济剥削。

三、描写日本警察的专横暴戾，及其如何鱼肉台湾的善良老百姓。

四、描写日本政府袒护日人的本位主义。

五、鼓励民众破除迷信，提倡结婚自由。

六、主张男女平等，提高女性地位。

七、鼓吹艺术风气，增加生活情趣。

八、保持纯朴民风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。^①

其中最重要的，当然是最后一类，因为它体现于其他七类之中，堪称这些报刊杂志的灵魂。

综上所述，可以看出台湾新文学运动的一些特点：

第一，以白话文为表现形式。

第二，以反帝爱国、争取民族解放为主要内容。

第三，文学上主张写实主义，提倡为人生而艺术。

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先驱者赖和晚年病重之际，有感于新文学运动的坎坷，心情沉重。著名作家杨云萍写道：“过了一会，赖和先生突然高声说：我们所从事的新文学运动，等于白做了！我诧然地注视着赖和先生。他把原来躺卧着的身体，撑起上半身来，用左手压住苦痛着的心脏。我慌忙地安慰他：不，等过了三、五十年之后，我们还是一定会被后代的人纪念起来的。”^② 果不其然，赖和逝世（1932年）后也就三五十年，七十年代前夜，开始了对日据时代台湾文学的再认识、再评价。由于张良泽、林戴、梁景峰等学者的促进和努力，已然卓见成效。先后出版了日据下台湾新文学“明集”（中文资料）和“潭集”（日文资料），《赖和全集》被列为“明集”第一集，还先后整理印行了《张我军文集》

以及日据时代作家杨逵、钟理和、吴浊流、朱点人、吕赫若、龙瑛宗等人的全集或选集。这方面的研究著述，也在进行之中，陆续发表了不少文章。关于日据时代文学的再认识、再评价的重大意义，陈映真在《文学来自社会反映社会》一文里写道：“先行代抵抗的民族文学家给予我们的教育是什么？首先，是他们有明显的历史意识，他们的文学，强烈表现了整个近代中国抵抗帝国主义的历史场景，其次，这些作家表现了勇于面对当时最尖锐的政治、经济、社会和文化诸问题，不逃避，不苟且，在抵抗中，正面表现了人类至高的尊严；再次，他们毫不犹豫地采取具有强烈革新意识和倾向的现实主义，作为他们文学表现的工具。对于台湾先行代民族抵抗作家的再认识和再评价，无疑地将成为新一代在台湾的中国文艺家最好的教材，承传这一伟大而光辉的传统，发扬而光大之。”^⑬

三五十年以后重新估价日据时代的新文学运动，使人们清楚地看到，它冲破外来的黑暗统治和强行同化，为振兴具有鲜明的中华民族传统的台湾文学，立下了不朽的功绩。

所谓“现代派”

五十年代在台湾逐渐兴起的“现代派”，并非一般意义的概念，而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。江帆《谈现代人与现代化》一文里曾解释过“现代”的一般含义：“在形式上，凡在人类历史社会中过活的每一个人，都曾经是‘现代’人。不仅从夏、商、周……到元、明、清，无论活在那一个朝代的人，都曾经是‘现代’人，便是活在新旧石器时代的人，也曾经都是‘现代’人。在喜欢高喊‘现代人’、‘现代

化’的今天，人人以自居现代人为荣，殊不知这种‘光荣’并非今天这个时代所独有，因为历史上每一个时代都有它的‘现代’化，也都有它的‘现代’人。”^⑭台湾文学的“现代派”既非此等含义，那么，究竟指的什么呢？这要从它的由来说起。

“现代派”的发祥地是台湾大学外文系，以1956年台湾大学外文系夏济安教授兴办的《文学杂志》为发端。它对传统文学虽不排斥，却着重于介绍西方的现代文学，并在创作实践中加以摹仿、借鉴和吸收。这个杂志以反映时代精神和说老实话为己任，“创刊号”的“编者的话”指出：“我们虽然身处动乱时代，我们希望我们的文学并不动乱。我们不想逃避现实。我们的信念是，一个认真的作者，一定是反映他的时代，表达他的时代精神的。我们并非不讲求文字的美丽，不过我们觉得更重要的是让我们说老实话。”

台湾文学的“现代化”，在不同文学形式之间极不平衡。就小说、散文、诗歌三种主要的文学形式来说，诗歌最甚，小说其次，散文则不明显。

1958年创刊的《现代文学》杂志是“现代派”小说的主要阵地，主编白先勇当时是台湾大学外文系的学生。王文兴、叶维廉、欧阳子、王桢和、七等生、陈若曦等也经常在这个杂志上发表作品。后来，他们中间许多人到了国外，集结于美国爱荷华大学的作家工作室，系统地介绍卡夫卡、卡缪、托马斯·曼、福克纳、詹姆斯、乔伊斯、海明威等西方现代作家和存在主义、超现实主义、意识流等西方的文学潮流和创作方法。融会贯通于自己的创作之中，甚至直接地加以摹仿，构成了台湾的现代派的小说。

诗歌的情形又怎样呢？号称台湾诗坛三老之一的纪弦等，1953年主编《现代诗》，挑起了“现代派”诗歌的旗帜，陆续创刊的有洛夫、痖弦主编的《创世纪》、覃子豪等主编的《兰星周刊》等诗刊。聚集在“现代派”诗歌旗帜之下的诗人有：纪弦、洛夫、郑愁予、余光中、罗门、痖弦、方思、商禽、覃子豪、周梦蝶、羊令野、李莎、蓉子等。“现代派”诗人组织于1956年在台北正式成立，这跟小说家无组织的状态是不一样的。他们喊出这样的口号：“领导新诗的再革命，推行新诗的现代化。”提倡“现代主义”的同时，打出“超现实主义”的口号，主张向国际水准看齐，进而超越国际水准，向世界诗坛学习，进而影响世界诗坛。他们有所谓六大信条，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追求横的移植，不要纵的继承。所谓横的移植，就是取法西方现代派的诗歌，而反对继承中国诗歌的优秀传统。

不论小说还是诗歌，所谓“现代派”都是明显的文学发展过程中的西方化倾向。陈映真《文学来自社会反映社会》一文里说：“从一般思潮来看，我可以举出一家‘自动关闭’的《文星》杂志。那时有一位作家，一连串地写了许多文章，其中表现的思想，无非是个人主义和对权威的怀疑和反抗，在中国未来的方向和道路的问题上，提出了一个口号——‘全盘西化’。甚至于大声疾呼：为了要全盘西化，我们应该不惜牺牲连西方的缺点也照单全收之。从思想内容上看，并没有新奇的地方。我们知道中国在1920或30年代，就有过这种‘中西文化’孰优的论战，而且讨论的很深刻、很广泛。从全局去看，基本上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。可是，由于台湾在一九四九年之后，由于各种因素和整个中国近代

思想传承发生了断绝，所以在发展的过程上，必须把这些老的，似乎在中国已经解决的问题，重新在台湾再绕个小圈。”^⑤这是针对一般文化而言的，台湾文学的西方化发生在五十年代，有其特定的历史原因。

国民党当局从大陆到了台湾，严厉禁止所谓三十年代文学。它把三十年代文学的范围划得非常宽泛，囊括了鲁迅、巴金、茅盾、老舍、郭沫若、曹禺、夏衍、沈从文、臧克家、张天翼、谢冰心等著名作家，这样，“五四”以来的文学传统人为地被中断了，在继往开来的重要阶段，竟然出现了空白，于是西方的现代文学潮流乘虚而入。“现代派”诗人只讲横的移植，不要纵的继承，在某种意义上说，也是走投无路，不得已而为之。如彭瑞金所分析的：“我想第二代作家不得不西化的原因有三：第一是因为三十年代的文学在台湾断绝了，他们的书不准看，作品不准讨论。第二是当时台湾本土的新文学，他们和三十年代作家色彩相似，却没有人提倡他们的作品。第三是因为语言隔绝。台湾作家努力学习用中文表达，而没有时间来延续上一代的文艺工作，只有在现在当我们要求开放三十年代的文学时，才想到台湾有很多新文学作家的作品应该翻译出来。所以我想是因为隔绝，并不是因为不受三十年代文学影响。而在这种隔绝状态中，西方文学大量输入，立刻风靡了当时的知识分子。”^⑥

如果说，台湾文学的“现代化”潮流是对民族传统的背离，那么，由此引起的所谓“现代派”之争以及“现代派”诗歌、小说的发展变化，却深刻地反映了台湾文学的民族传统。

“现代派”小说介绍西方现代小说流派，学习运用西方